

DOI:10.3969/j.issn.1674-8131.2014.05.02

# 劳动力及人口城乡配置的户籍控制机制研究\*

吴华安<sup>a,b</sup>

(重庆工商大学 a.融智学院,重庆 400333;b.长江上游经济研究中心,重庆 400067)

**摘要:**城乡分割的户籍制度是我国人口大规模“非正式迁移”长期存在的重要原因。从经济学视角看,户籍制度在不同等级城市政府间出现改革程度及进度的差异有着内生性根源,数量模型推导的结果表明: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农业劳动力流动的原动力来自城市和农村效用最大化的组合决策,依附于户口差别的收入和福利差距以及城市和农村两个维度的户籍门槛内生性地调控着农业劳动力非农就业转移的规模,同时引导着非农就业转移劳动力及其附载人口在不同城市之间的户籍配置。

**关键词:**户籍制度改革;劳动力流动;农业劳动力转移;非正式迁移;非农就业;户籍迁移;收入差距;福利差别;户籍门槛;城乡二元结构

中图分类号:F241.22;C92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8131(2014)05-0013-09

## 一、引言

我国户籍制度是对公民生产生活有着深刻影响的一种社会管理制度,其形成与演变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计划经济体制的制度性痕迹大多数都泯灭在市场化进程之中,唯有成型于1958年的户籍制度藩篱仍然显现着计划经济时期的烙印。同转型期其他社会经济制度改革进度相比,户籍制度改革被视为我国除政治体制之外进度最慢的改革之一。虽然改革收入分配方式可以缩小贫富差距及区域差距,但由于户籍制度特有的人口迁移控制及利益分配功能,户籍制度及其关联的“零碎化”农地制度和“城市倾向”的福利体制,仍然是城乡差距不断扩大的症结所在。因此,加快现行户籍制度及其关联制度改革已成为社会各界

的共识。

目前,多数发达国家对国内人口实行自由迁移政策,只在为数不多的发展中国家采取了比较严格的迁移控制政策。因此,国外学者有关发达国家户籍或户口问题的研究,以服务于人口学和统计学的目的居多;而对发展中国家户籍制度相关问题的关注,更多的是在于解释贫困国家与富裕国家的社会经济政策差异,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城市偏向政策对人口流动、社会公平及城乡区域发展不协调的影响。在发展中国家,城市倾向的经济社会政策广泛存在(Lipton, 1977),究其原因,在于发展中国家农民虽人数众多,但居住分散,在集体行动中的“搭便车”现象使其对政策制定影响甚微,政策往往向城市居民倾斜(Olsen, 1985);在工业化背景下全国性的城市户籍限入制度导致城乡居民的收入及福利

\* 收稿日期:2014-04-03;修回日期:2014-07-06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资助项目(11CJY032);重庆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重大课题公开招标项目(2010CQZDZ14);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招标项目(CJSY201002);重庆市教委科学技术研究项目(KJ110722)

作者简介:吴华安(1974—),男,四川仁寿人;副教授,博士,现任重庆工商大学融智学院副院长、长江上游经济研究中心兼职研究人员,主要从事人口迁移与区域发展研究;Tel:023-65172626, E-mail:wuhuaan@sohu.com。

差距得以形成、巩固和扩大(Wang et al, 1999),这种差距又使得城市居民成为一个相对独立的既得利益群体,并成为维护这种制度安排的力量(Dorothy, 1999)。

由于中国户籍制度的特殊性、典型性及其影响的深刻性,国内外众多学者从历史学、经济学、社会学和政治学等多视角对其展开了广泛研究。户籍制度造成中国的农村、小城镇、中等城市、大城市之间存在着资源配置和福利待遇等方面的“社会空间等级”差别现象,促成城乡劳动力市场分割,且抑制劳动力流动的旧体制反复回潮(Chan, 1999);同时,户籍制度因承载国家资助的福利分配而让农民向城市的永久性迁移变得困难(Chan et al, 2008);户籍制度是中国实现现代化,成为全球领导者的一个主要障碍(Chan, 2009)。尽管在转型进程中户口控制已经放松,但因法律上的模糊不清和地区的差异性,户籍制度还是中国计划经济体制正式组成部分的一块“硬骨头”。至于在什么条件下户籍制度改革才有望突破,即公民可以自由获得城市户口,劳动力市场不再有歧视,取决于两个时机的出现:一是劳动力需求格局的变动,即城市经济发展对外来劳动力需求的大幅度提高,这可能成为体制转变的契机;二是城市劳动力保障制度的完善,即如果城市外来劳动力的就业保障比较确定时其权利也会相应提高(Dorothy, 1999)。

相比国外的研究,国内学界对我国的户籍控制及其产生的根源、给城乡劳动力收入差距与福利差别带来的影响等方面的研究要全面和深刻得多。限制农村劳动力自由流动的户籍制度,缘于国家解决优先发展重工业的经济发展模式与资源禀赋之间矛盾的路径所致(林毅夫等, 1999);但封闭僵化的户籍制度与开放自由的市场经济体制格格不入,既妨碍实现社会公平,又阻碍提高社会生产效率(任文, 1999),户籍制度也因此成为劳动力市场上就业保护的制度基础(蔡昉等, 2001),是把城乡人口及劳动力分隔开的最重要的制度安排(王美艳等, 2008);城乡劳动者在就业、工资、职位晋升、劳资关系等方面存在较大的差异,从而在城市内部形成一种二元结构,把城市本地居民和进城农民工分离在城市的不同领域(乔明睿等, 2009)。

地区间经济差距和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存在以及公共产品低水平供给,是户籍制度长期存在的

重要原因(夏纪军, 2004);户籍制度的存在阻碍了通过劳动力流动缩小城乡差距的实现(蔡昉, 2009),城乡收入差距的28%可以被户籍制度直接解释(Shi, 2002);拥有本地城市户口的劳动者比农村劳动者更容易进入高收入行业(陈钊等, 2009),大部分进城农民工在城市就业的工资收入长期处于较低水平(孙宁华等, 2009);除了个体特征差异外,户籍歧视可解释导致农民工高职业流动率原因的86.63%(李长安, 2010);入职户籍门槛是阻碍农民工进入可获取较高收入的公有制单位的重要原因,而单位之间的收入差异又是城市工人与农民工之间总体收入差距的主要部分(田丰, 2010)。可见,户籍制度对劳动力流动与城乡收入差距扩大悖论的形成具有“门槛效应”(安虎森等, 2011);个人特征差异及行业间差异并不能完全解释城镇劳动力市场上不同户籍就业人口的收入差异,这种差异可能反映了他们在经济福利方面被区别对待的事实(金成武, 2009)。

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的歧视性配置是导致城乡收入差距扩大的不容忽视的原因之一(李实, 2003)。分权财政下的地方户籍管制程度与软公共品供给增长速度呈显著非线性U形相关关系(菊红等, 2011);户籍制度对流动人口享有与本地人口均等化的公共服务和社会福利造成歧视性排斥(李涛等, 2011);大城市的城乡户籍差异对“五险一金”及最低生活保障差距有较大的影响,户籍已成为人们获取公共福利资源的资格条件(彭小辉等, 2013);社会保障、教育等公共产品城乡户籍利益的二元化是当今户籍制度壁垒的突出表现(李健英, 2005)。户籍没有阻止农民进城,但却让农村人口享受不到一些城市福利和公共服务;土地制度让农民家庭获取的一小块土地虽不能致富,却可以发挥最后社会安全网的作用(樊纲, 2011)。改革开放后直接粘附于户口之上的城乡差别减少了,但社会资源配置机制中户口的间接粘附功能依然存在,甚至被强化(陆益龙, 2003)。当然,我国的城镇化既存在着城市内部户籍与非户籍人口分享城市福利的失衡,更面临着不同规模城市发展水平失衡的加剧(邹一南, 2014)。

综上所述,由于户籍制度对我国乡城人口自由迁移的控制,农业剩余劳动力向工业转移缓慢且不彻底,依附于此的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既不同步更

不完全,这也是中国人口大规模“非正式迁移”现象存在的制度根源。由于中国户籍制度在形成和演进过程中,除了人口登记管理的功能外,已附加了不少利益分配和机会获取的功能,户籍制度也从初始状态的外生变量,逐渐在运行中转化为社会经济系统的一种内生力量,非市场壁垒的“户籍墙”已成为农村劳动力及家庭人口迁移不彻底、城市吸纳农村人口不充分的制度障碍。因此,只有加快松绑直至根除户籍制度等限制人口“正式迁移”的制度壁垒,才能从根本上解决二元结构的有序转换问题。

二元结构转换本质上伴随有劳动力的供需变化,当劳动力供需在城乡及农业与非农业之间的力量对比发生变化,特别是“刘易斯转折点”出现后,竞争型地方政府也会在“增长与民生”的权衡中,开始通过降低城市户籍门槛和提供数量更多、质量更高的社会福利,来引导农业劳动力及农村人口转移流向及流量的改变;而农村家庭的人口迁移也将会从追求经济收入单一目标,逐渐向追求经济收入、福利保障和发展能力等多重目标转变。在这种激励相容的背景下,农村和城市都将面临劳动力及人口转移或吸纳的选择,这种选择也是一个从数量到质量的过程,而其最终目的都可归结为从农村和城市出发的利益与福利最大化问题。

随着日渐逼近的“刘易斯转折点”和“人口红利”的跨区域竞争,加快现行户籍制度及其关联制度改革的呼声不断,但目前国家层面仍以适应性调整策略为主,而各省市则不断探索围绕户籍制度的制度联动改革模式。如:上海的“居转户”和广东的“积分入户制”,突出户籍制度与城市福利体制改革配套;重庆的“农转城”和成都的“全域自由迁徙制”,则尝试土地制度、福利体制与户籍制度等多元改革联动。然而,现实生活中的农业劳动力非农就业转移与户口迁移依旧难以同步,“人户分离”“居户分离”现象仍然突出。为何农业劳动力时常出现务农与非农就业的选择转换?非农就业转移劳动力为什么会出现户口迁移的困难?不同城市为什么会设置不同的户籍门槛来吸纳非农就业转移人口?等等,这些问题仍有待更为广泛和深入的研究。而已有文献的相关研究大多基于理论上的定性分析或经验数据的统计分析,很少有基于数理模

型的探讨。有鉴于此,本文试图从经济学视角用一个数量模型的推导来说明城乡劳动力转移与吸纳的户籍调控发生机制,以丰富有关理论研究,并为户籍制度及其关联制度的改革实践提供参考和借鉴。

## 二、参数设定与基本模型

### 1. 主要参数设定

在不影响主要结论的前提下,为简化分析,本文假定一个社会由一个自然村和一个城市构成,农业和非农业是城市和农村的分界线。在 $t$ 时期,农村户籍总人口为 $N_n(t)$ ,农业总劳动力为 $L_n(t)$ ;城市户籍总人口为 $N_c(t)$ ,非农业总劳动力为 $L_c(t)$ ;非农就业对农业劳动力吸纳率(或农业劳动力非农就业转移率)为 $\delta(t)$ ,非农就业农业劳动力户籍迁移率为 $\eta(t)$ ;农村户籍和城市户籍劳动力非农就业的人均工资水平分别为 $\omega_n(t)$ 和 $\omega_c(t)$ ;农村户籍居民和城市户籍居民的总福利分别为 $\varphi_n(t)$ 和 $\varphi_c(t)$ ,其中基于国民身份享有的“普惠性福利”水平分别为 $\varpi_{n0}(t)$ 和 $\varpi_{c0}(t)$ ,基于就业贡献获得的“市场性福利”水平分别为 $\varpi_{n1}(t)$ 和 $\varpi_{c1}(t)$ 。总体而言,尽管土地对农民来说仍长期担负着较强的养老保障功能,城乡居民的总福利水平主要由 $t$ 时期城市总产出的一部分来提供<sup>①</sup>。通常有: $0 \leq \delta(t) < 1, 0 \leq \eta(t) \leq \delta(t), 0 < \omega_n(t) < \omega_c(t), \varpi_{n0}(t) < \varpi_{c0}(t), \varpi_{n1}(t) < \varpi_{c1}(t)$ 。

同时,为了便于分析,假定农村与城市的生产函数为C-D生产函数(Jorgenson, 1967; Mas-Colell et al, 1973; 陈钊等, 2008)。其中,在 $t$ 时期农村的农业生产 $Y_n(t)$ 只依靠土地 $M_n(t)$ 和农业劳动力两种投入;城市的非农业生产 $Y_c(t)$ 则依靠资本 $K(t)$ 和非农就业劳动力两种投入,且城市的投资为 $I(t)$ ,资本的折旧率为 $\gamma$ ;农村和城市面临的技术状态因素分别用 $\alpha$ 和 $\beta$ 表示;城市居民公共消费函数用 $\chi_c(t)$ 表示,农村居民总效用函数用 $\chi_n(t)$ 表示。其中, $0 < \alpha < 1, 0 < \beta < 1, 0 < \gamma < 1$ 。

### 2. 基本模型

由上述参数可分别得到从城市和农村出发的产出(收入)、福利与效用等基本模型。

<sup>①</sup> 在工业化和城市化中后期,包括中国在内的多数国家通常对农业、农村和农民采取保护措施,即实施减免农业税、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等政策,农村居民的总福利主要由城市转移支付和农业劳动力基于对城市及非农产业的贡献来保障。

## (1) 农村总产出与农民的福利函数

在没发生农业劳动力非农就业转移情况下,  $t$  时期农村的总产出函数(为简化公式,从此处开始时期  $t$  均省略)可表示为:

$$Y_n = L_n^\alpha M_n^{1-\alpha} \quad (1)$$

在农业和非农业之间,农业劳动力只进行就业的优化配置,且假定这部分非农就业的全部收入均流回农村,则模型(1)扩展为:

$$Y_n = [(1-\delta)L_n]^\alpha M_n^{1-\alpha} + \delta L_n \omega_n \quad (2)$$

基于就业机会与收入水平在城乡户籍身份上存在差距的事实,在农业劳动力进行产业间配置时,有一部分能够实现城乡户籍的地域转换,且假定这部分实现户籍迁移劳动力的劳动收入全部留在城市,则模型(1)进一步演化为:

$$Y_n = [(1-\delta)L_n]^\alpha M_n^{1-\alpha} + (1-\eta)\delta L_n \omega_n \quad (3)$$

在模型(3)的情况下,农村居民的基本福利函数可表示为:

$$\varphi_n = (N_n - \eta\delta L_n) \varpi_{n0} + (1-\eta)\delta L_n \varpi_{n1} \quad (4)$$

## (2) 城市总产出与市民的福利函数

在没有吸纳农业劳动力非农就业的情况下,城市的总产出函数可表示为:

$$Y_c = L_c^\beta K^{1-\beta} \quad (5)$$

事实上,农业剩余劳动力向非农就业转移是城乡二元结构转换的必然过程,在此情况下模型(5)可扩展为:

$$Y_c = (\delta L_n + L_c)^\beta K^{1-\beta} - \delta L_n \omega_n \quad (6)$$

更进一步讲,假定农业劳动力非农就业转移中的一部分能够实现城乡户籍的地域转换,且这部分群体的劳动收入全部留在城市,则模型(6)进一步演化为:

$$Y_c = (\delta L_n + L_c)^\beta K^{1-\beta} - (1-\eta)\delta L_n \omega_n \quad (7)$$

同时假定城市的资本积累过程为:

$$\dot{K} = I - \gamma K \quad (8)$$

在模型(7)的情况下,城市居民的基本福利函数可表为:

$$\varphi_c = (N_c + \eta\delta L_n) \varpi_{c0} + (\eta\delta L_n + L_c) \varpi_{c1} \quad (9)$$

## (3) 城乡居民总福利的约束函数

假定城乡居民的基本福利水平总体上受城市的总产出、城市户籍劳动力和非农就业农业劳动力的劳动报酬以及投资等因素的制约,进而可得城乡居民总福利的约束函数:

$$\begin{aligned} \varphi_n + \varphi_c \leq & Y_c - (1-\eta)\delta L_n \omega_n - \\ & (\delta\eta L_n + L_c)\omega_c - K \end{aligned} \quad (10)$$

## 三、城市居民公共消费最大化下非农就业农业劳动力吸纳的户籍控制

首先,假定城市居民公共消费水平主要来自城市总产出扣除城市户籍劳动力的就业报酬、投资以及城乡居民总福利后的剩余,则城市居民公共消费函数为:

$$\chi_c = Y_c - (\eta\delta L_n + L_c)\omega_c - I - \varphi_c - \varphi_n \quad (11)$$

将式(8)代入式(11),可得城市资本积累方程:

$$\begin{aligned} \dot{K} = & Y_c - (\eta\delta L_n + L_c)\omega_c - \gamma K - \varphi_c - \\ & \varphi_n - \chi_c \end{aligned} \quad (12)$$

将式(4)(7)(9)代入式(12)进一步整理得:

$$\begin{aligned} \dot{K} = & (\delta L_n + L_c)^\beta K^{1-\beta} - \{\delta L_n[(1-\eta)\omega_n + \eta\omega_c] + \\ & L_c\omega_c\} - \gamma K - \{(N_n \varpi_{n0} + N_c \varpi_{c0}) + \eta\delta L_n[(\varpi_{c0} - \\ & \varpi_{n0}) + (\varpi_{c1} - \varpi_{n1})] + (L_c \varpi_{c1} + \delta L_n \varpi_{n1})\} - \chi_c \end{aligned} \quad (13)$$

假设城市居民(或者代表他们的城市政府)的公共消费效用函数为  $U(\chi_c)$ ,且  $U'[\cdot] > 0, U''[\cdot] < 0$ 。则城市会先通过调控吸纳农业劳动力非农就业的规模实现总产出最大化,然后再通过控制非农就业农业劳动力的户籍状态来实现跨期的公共消费效用最大化。于是,城市的最优化问题可表示为:

$$\max_{H_c, \delta} \int_0^{+\infty} e^{-\rho t} U(\chi_c) dt \quad (14)$$

$$\begin{aligned} st.: \dot{K} = & (\delta L_n + L_c)^\beta K^{1-\beta} - \{\delta L_n[(1-\eta)\omega_n + \\ & \eta\omega_c] + L_c\omega_c\} - \gamma K - \{(N_n \varpi_{n0} + N_c \varpi_{c0}) + \\ & \eta\delta L_n[(\varpi_{c0} - \varpi_{n0}) + (\varpi_{c1} - \varpi_{n1})] + (L_c \varpi_{c1} + \\ & \delta L_n \varpi_{n1})\} - \chi \end{aligned} \quad (15)$$

$$0 \leq \delta < 1; 0 \leq \eta \leq \delta; 0 < \gamma < 1; K(0) = K_0$$

此问题的现值汉密尔顿函数为:

$$\begin{aligned} \dot{\chi}_c = & U(\chi_c) + \\ & \lambda \left[ (\delta L_n + L_c)^\beta K^{1-\beta} - \{\delta L_n[(1-\eta)\omega_n + \eta\omega_c] + \right. \\ & \left. L_c\omega_c\} - \gamma K - \{(N_n \varpi_{n0} + N_c \varpi_{c0}) + \eta\delta L_n[(\varpi_{c0} - \right. \\ & \left. \varpi_{n0}) + (\varpi_{c1} - \varpi_{n1})] + (L_c \varpi_{c1} + \delta L_n \varpi_{n1})\} - \chi \right] \end{aligned} \quad (16)$$

则满足城市居民公共消费最大化问题的解的

要求条件为:

$$\frac{\partial \mathcal{X}}{\partial \mathcal{X}_c} = U'(\cdot) + \lambda = 0 \quad (17)$$

$$\frac{\partial \mathcal{X}}{\partial \delta} = \lambda \left\{ \beta L_n (\delta L_n + L_c)^{\beta-1} K^{1-\beta} - \left\{ L_n [(1-\eta) \times \omega_n + \eta \omega_c] \right\} - \left\{ \eta L_n [(\varpi_{c0} - \varpi_{n0}) + (\varpi_{c1} - \varpi_{n1})] \right\} + (L_c \varpi_{c1} + \delta L_n \varpi_{n1}) \right\} \leq 0, \quad \text{且 } \delta \frac{\partial \mathcal{X}}{\partial \delta} = 0 \quad (18)$$

$$\frac{\partial \mathcal{X}}{\partial K} = \lambda \left\{ (1-\beta) (\delta L_n + L_c)^{\beta} K^{-\beta} - \gamma \right\} = \rho \lambda - \dot{\lambda} \quad (19)$$

$$\lim_{t \rightarrow \infty} e^{-\rho t} \lambda(t) K(t) = 0 \quad (20)$$

由式(15)的互补松弛条件可知,如果城市初始资本量并不多,则一开始  $\delta$  取不到内点解,因而  $\delta(t)$  是一分段函数,即:当  $K_0 < K'_0$  或  $t < t'$  时,  $\delta(t) = 0$ ; 当  $K_0 \geq K'_0$  或  $t \geq t'$  时,  $\delta(t) > 0$ , 其中  $K'_0 = K(t')$ 。当  $K_0 \geq K'_0$  时,  $\delta$  为下列方程的解:

$$\delta = \frac{L_c}{L_n} \left| \beta^{\frac{1}{1-\beta}} \left( \frac{K}{L_c} \right) / \left\{ (\omega_n + \varpi_{n1}) + \eta [(\omega_c - \omega_n) + (\varpi_{c0} - \varpi_{n0}) + (\varpi_{c1} - \varpi_{n1})] \right\}^{\frac{1}{1-\beta}} - 1 \right| \quad (21)$$

由城市居民公共消费最大化下对农业劳动力非农就业吸纳率的解,可推演出从城市出发的农业劳动力户籍迁移供给规模的发生机制:

$$\eta = \frac{\beta \left( \frac{K}{\delta L_n + L_c} \right)^{1-\beta} - (\omega_n + \varpi_{n1})}{(\omega_c - \omega_n) + (\varpi_{c0} - \varpi_{n0}) + (\varpi_{c1} - \varpi_{n1})} \quad (22)$$

从式(21)(22)可知,当  $K < K'_0$  时,满足城市户籍人口公共消费最大化的城市初始资本投入有限,城市缺乏吸纳农业劳动力非农就业的内在动力,农业劳动力及其附载人口难以获得向城市流动和迁移的机会。当  $K \geq K'_0$  时,随着满足城市居民公共消费最大化的城市资本投入增加,城市将会产生吸纳农业劳动力非农就业转移的内在需求,农业劳动力非农就业附载人口的户籍迁移也可能随之发生,且非农就业的吸纳需求量及其附载人口的户籍迁移量会随着城市资本积累的增加而提高,在此情况下,城市可通过不同户籍非农就业劳动力的收入差距和福利差别来调控非农就业劳动力的吸纳水平及其户籍迁移量。由此可得命题1及延伸命题1。

**命题1:**在其他条件不变的前提下,在城市发展的初期,如果城市初始的资本存量较少,城市将缺乏吸纳农业劳动力非农就业转移的动力。但随着控制城乡居民劳动报酬及福利支出、抑制城乡居民消费、农村及农业支持城市及工业发展等为城市累积的资本不断增加,基于城市户籍居民公共消费最大化考虑,城市及工业对农业劳动力非农就业的吸纳需求会不断增加;在资本积累过程没有停止前,城市资本积累是城市对农业劳动力非农就业吸纳率  $\delta$  的增函数;而在较长时期内控制农村户籍非农就业劳动力的工资及“贡献型福利”水平,即保持城乡户籍非农就业劳动力工资及福利水平的适当差距,对城市维持高吸纳水平有强化作用。

**延伸命题1:**如果基于自身公共消费最大化的城市已产生了吸纳农业劳动力非农就业的需求,则非农就业转移的农业劳动力实现户籍迁移的机会,与城乡户籍非农就业劳动力工资性收入、“普惠型福利”和“贡献型福利”的差距,以及农业劳动力非农就业转移获得的直接工资性收入和“贡献型福利”的大小成负相关关系。即农业劳动力非农就业转移获得的工资性收入和“贡献型福利”越多、与城市户口劳动力之间的收入差距及福利差别越大,其实现户籍迁移的机会就越小;反之,则越大。同时,非农就业劳动力人均资本水平及其增长速度对户籍迁移规模起平衡作用。

#### 四、农村居民总效用最大化下农业劳动力非农就业转移的户籍控制

由于农村居民总效用函数为总收入与总福利之和,在农村居民通过劳动力的产业间配置和户口的乡城间配置后,可根据式(3)(4)得出农村居民总效用函数:

$$\mathcal{X}_n \leq Y_n + \varphi_n = [(1-\delta)L_n]^\alpha M_n^{1-\alpha} + (1-\eta) \times \delta L_n \omega_n + (N_n - \eta \delta L_n) \varpi_{n0} + (1-\eta) \delta L_n \varpi_{n1} \quad (23)$$

按照实现总效用最大化的劳动力配置条件要求,可由式(23)两边对农业劳动力非农就业配置比例  $\delta$  的导数给出,即:

$$\frac{\partial \mathcal{X}_n}{\partial \delta} \leq \frac{\partial Y_n}{\partial \delta} + \frac{\partial \varphi_n}{\partial \delta} = \left\{ -\alpha(1-\delta)^{\alpha-1} L_n^\alpha M_n^{1-\alpha} + (1-\eta)L_n \omega_n - \eta L_n \varpi_{n0} + (1-\eta)L_n \varpi_{n1} \right\} = 0 \quad (24)$$

整理可得农村居民总效用最大化下农业劳动力非农就业转移率的约束条件:

$$\delta = 1 - (\alpha)^{\frac{1}{1-\alpha}} \times \left( \frac{M_n}{L_n} \right) \times \frac{1}{[(\omega_n + \varpi_{n1}) - \eta(\omega_n + \varpi_{n0} + \varpi_{n1})]^{\frac{1}{1-\alpha}}} \quad (25)$$

进而可由农村居民总效用最大化下农业劳动力非农就业转移率的解,衍生出从农村出发的户籍迁移需求的调节机制:

$$\eta = \frac{\omega_n + \varpi_{n1} - \alpha \left[ \frac{M_n}{(1-\delta)L_n} \right]^{1-\alpha}}{(\omega_n + \varpi_{n0} + \varpi_{n1})} \quad (26)$$

由式(25)(26)可知,从农村居民总效用最大化视角出发,以农业劳动力劳均耕地面积反映的人均收入水平动态地影响着非农就业转移率的高低及户籍迁移的诉求,而非农就业转移劳动力的工资水平及其在城市基于就业的“贡献型福利”和在农村基于公民的“普惠型福利”对就业转移和户籍迁移的水平也有影响。再进一步看,农业劳动力在城市非农就业的工资水平从低到高、“市场型福利”水平从无到有及从小到大的变化,不仅可能直接增加他们在农村的当期收入,也将较大程度地提升他们远期消费水平的预期,这都可能提高农业劳动力非农就业转移率(即使户籍迁移的机会没有改变)和户籍迁移需求(即使非农就业转移率没发生变化);而农业劳动力劳均耕地面积和农村的“普惠型福利”等不断增加的现实及趋势,又会对农业劳动力的非农就业转移率和户籍迁移需求产生一定的抑制作用。由此可得命题2及延伸命题2。

**命题2:**其他条件不变,如果城市对农业劳动力非农就业的吸纳需求已经发生,且农业劳动力数量庞大或存在相对剩余,则从农村居民总效用最大化视角出发的农业劳动力非农就业转移水平,与动态的农业劳动力劳均耕地面积成负相关关系,而农村居民的“普惠型福利”水平、农业劳动力非农就业的工资收入及其“贡献型福利”水平对该转移水平有正向平衡作用。

**延伸命题2:**其他因素不变,如农业劳动力非农就业转移已经发生,则从农村居民总效用最大化出发的农业劳动力户籍迁移需求,与动态的实际务农劳动力劳均耕地面积成负相关关系,而维持农业劳动力非农就业转移的工资水平、“贡献型福利”和作为农村公民获得的“普惠型福利”则分别从正向和反向调节着户籍迁移需求的变化。

## 五、农业劳动力非农就业转移与吸纳的户籍平衡机制

如把式(21)与(25)联系起来,同时从城市和农村两个维度出发考察城市劳动力吸纳与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内在机理,如式(27),则不难发现:在农业劳动力存量较大的情况下,如果城乡之间已经发生了劳动力的流动,则从农村和城市最优化出发的农业劳动力非农就业转移率与吸纳率之间可能存在一致的一面。在其他因素一定的情况下,从农村出发的农业劳动力转移率 $\delta_n$ ,会随动态的初始劳均农业收入( $\frac{M_n}{L_n}$ )的提高而下降,随农业劳动力非农转移就业收入及其“市场型福利”的增加而上升,但却随户籍迁移机会的增加而下降;从城市出发的农业劳动力吸纳率 $\delta_c$ ,会随动态的初始劳均资本产出率( $\frac{K}{L_c}$ )的提高而上升,随农业劳动力非农转移就业收入及其“市场型福利”的增加而下降,同时也随户籍迁移机会的增加而下降。由此可见,在城乡之间劳动力存量悬殊的背景下,农村初始劳均农业收入与城市初始劳均资本产出之间的动态差距构成了农业劳动力非农就业转移的基础,而城乡农业劳动力非农就业转移与吸纳之间的平衡机制则缘自城乡之间务农与非农就业的收入水平和福利水平以及户籍迁移的机会。

$$\frac{\delta_c}{\delta_n} = \frac{L_c}{L_n} \times \left| \beta^{\frac{1}{1-\beta}} \left( \frac{K}{L_c} \right) / \{ (\omega_n + \varpi_{n1}) + \eta [ (\omega_c - \omega_n) + (\varpi_{c0} - \varpi_{n0}) + (\varpi_{c1} - \varpi_{n1}) ] \}^{\frac{1}{1-\beta}} - 1 \right| / \left\{ 1 - (\alpha)^{\frac{1}{1-\alpha}} \times \left( \frac{M_n}{L_n} \right) \times 1 / [ (\omega_n + \varpi_{n1}) - \eta (\omega_n + \varpi_{n0} + \varpi_{n1}) ]^{\frac{1}{1-\alpha}} \right\} \quad (27)$$

同时,如果把式(22)与(26)联系起来,从基于城市公共消费最大化和农村总福利最大化的城乡人口户籍迁移的控制机理来看,如式(28),则更容易理解城市户籍制度改革为何总体进展缓慢的内在原因。

$$\eta_n = \frac{\beta \left( \frac{K}{\delta L_n + L_c} \right)^{1-\beta} - (\omega_n + \varpi_{n1})}{(\omega_c - \omega_n) + (\varpi_{c0} - \varpi_{n0}) + (\varpi_{c1} - \varpi_{n1})} \quad (28)$$

$$\frac{\eta_n}{\omega_n + \varpi_{n1}} = \frac{\alpha \left[ \frac{M_n}{(1-\delta)L_n} \right]^{1-\alpha}}{(\omega_n + \varpi_{n0} + \varpi_{n1}) - (\omega_n + \varpi_{n0} + \varpi_{n1})}$$

从式(28)可知,由于城市是农业劳动力非农就业转移的吸纳地,也自然成为城市落户门槛设置的主导者,如果城乡劳动力对比悬殊,在农业劳动力非农就业转移已经发生的情况下,同时考虑城市居民公共消费最大化的户籍门槛设置和农村总效用最大化的户籍迁移机会两个维度,则城市的户籍门槛设置与农村的户籍迁移机会之间,既有一致性,也存在矛盾性。

在其他因素不变的条件下,从城市角度出发,当动态的初始劳均资本产出率较高、农业劳动力非农就业转移的数量较小(或转移劳动力占城市劳动力的比重相对低)、城乡之间的直接工资收入及“贡献型福利”等差距较小(或非农就业转移劳动力在城市获得的报酬及福利较少)时,城市设置的落户条件将相对宽松, $\eta_c$ 的值将会较大,城市吸纳以非农就业劳动力为载体的农村人口落户将会更主动;反之,城市吸纳以非农就业劳动力为载体的农村人口落户会趋于保守,城市的落户条件会相对严厉,农村向城市迁移户籍的难度增大,这一点可由北京、上海、广州以及省会级大城市当前的户籍政策所证实。

从农村角度出发,当动态的初始劳均农业收入较高、农业劳动力非农就业转移的数量较小、非农就业获得的直接工资收入及“贡献型福利”较大、农村的“普惠型福利”较低时, $\eta_r$ 的值将会较大,以非农就业为载体的农村人口向城市迁移户籍的机会将会更多;反之,迁移户籍的机会将会更小。

由此可见,从城市和农村两个视角出发的落户门槛与户籍迁移需求既与城乡之间初始的生产效率有关,也与农业劳动力非农就业吸纳率和转移率有关,还与城乡之间的收入和福利的水平及差距有关。其中,农业劳动力非农转移就业所获得的直接工资收入及“贡献型福利”水平成为城市户籍门槛条件和农村户籍迁移需求之间矛盾的焦点,该水平差距越大,则落户城市的门槛更高,户籍迁移的机会更少,但户籍迁移的需求会更大。

结合式(27)和(28)以及我国劳动力非农就业转移及户籍制度改革进程的实际来看,总体上吸纳农业劳动力非农转移就业越多的城市,往往也是区域城乡之间收入及福利水平差距越大的地方,虽从农村出发的户籍迁移需求较高,但从城市出发的户籍门槛条件会更高。由于城市在设置户籍门槛条

件的过程中处于主导地位,出于城市居民公共消费最大化的考虑,在工业化和农地制度变迁的过程中,城市一开始可通过较高的资本积累率和较低的农业劳动力非农就业报酬及其福利来维持较高的吸纳率。当城乡劳动力对比发生变化,农村剩余劳动力数量降低到一定程度后,劳均农业收入水平提高的速度快于农业劳动力非农就业报酬及其福利增长的速度,农业劳动力非农就业转移率将会下降;而此时城市继续维持较高的资本积累率也不现实,相对提高的农业劳动力非农就业报酬及其福利水平也会降低城市对农村人口的吸纳率,因而城市将会借助对非农就业的直接工资收入及“贡献型福利”水平等的调整,利用户籍门槛动态地保证城市人口吸纳率与农村人口转移率的大体一致。

## 六、结论与启示

任何一项社会制度的形成均有相应的环境,而其演变与消亡也需要一定的条件。我国现行的户籍制度形成于计划经济体制时期,演变于经济体制转轨时期,但却长期处于边际性改革过程中,目前虽出现了加速改革的表征,却因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差异在不同城市之间出现了分化。如果从国家当前推进以“人口城镇化”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战略来看,本文用动态的劳均农业收入和劳均资本产出、城乡户籍劳动力非农就业的工资收入、城乡居民的“普惠型福利”和基于市场就业的“贡献型福利”等现实指标,对城市劳动力吸纳和农村劳动力转移两个维度的户籍调控机制进行了推导和诠释,可为各地方政府制定差异化的户籍制度改革策略提供一定的参考。

从城市出发的户籍门槛条件及其变化,伴随着城市初始资本存量多寡及其累积程度的变化,借助户口性质主导着对非农就业收入及福利水平的控制,动态地调节着农业剩余劳动力在区域之间、城乡之间以及城市之间的非农就业以及户籍人口配置,既实现了城市居民公共消费的优化,也促进了地方政府追求经济增长和政治业绩的目标实现。因此,对于那些规模较大的城市而言,由于已经累积形成了庞大的资本存量,且吸纳农业劳动力非农就业的人口数量也较多,放开户籍限制的动力不足,其户籍门槛条件设置与户籍迁移需求之间的矛盾会比较突出。缓和这种矛盾的主要手段有:一方

面,在保持不同户籍的非农就业劳动力收入及福利水平存在一定合理差距的同时,应不断提高农业劳动力非农就业的收入(如提高最低工资标准)及其“贡献型福利”;另一方面,通过产业结构的调整与优化升级,增加对高素质、技术型劳动力的需求,缩减对低素质、体力型劳动力的需求,驱动农业劳动力在不同城市之间形成基于产业结构层次的非农就业转移配置,为“有稳定就业、有稳定住所、有稳定持续社会保障”的农民工群体最终以常住居民身份落户城市创造条件。

从农村出发的户籍迁移需求及其变化,受农村初始劳动力存量及其相对剩余程度的影响,也被动地接受着户口性质对农业劳动力务农与非农就业收入及福利水平的控制,使农业劳动力在就业转移与户口迁移的动态配置中实现农村总收入和总效用的最大化。只要没有消除城乡劳动力因户口差别引致的非农就业待遇差距,为累积获得以城市户口为基础的工资和福利收入的机会,农业劳动力向城市非农就业转移将会持续。因此,对于那些农业劳动力非农就业转移较多、户籍迁移诉求总体相对高的农村而言,应通过平衡大、中、小城市之间的户籍迁移诉求使户籍迁移机会更容易地变成现实,可采取的措施有:一方面,从整体上提高农村居民的“普惠型福利”水平,尽快缩小城乡居民之间因户口性质不同的基本福利差距,可降低因“普惠型福利”差距带来的农业劳动力户籍迁移诉求;另一方面,由于不同规模等级城市之间的非农就业收入及“贡献型福利”水平存在差别,非农就业转移的农业劳动力在户籍迁移上存在与城市等级相同方向的诉求强弱,这种不平衡的结果造成了大城市落户更加困难,可通过调整国家层面的收入分配及福利保障政策,逐步缩小不同城市之间非农就业的收入及“贡献型福利”水平的差距来予以平衡。

总体上讲,不论从城市出发,还是从农村考虑,户籍制度变革的原动力均可视为来自效用最优化的组合决策。虽然城市多为主动,农村多为被动,但变革中的户籍门槛条件都将在现实生活中依托于非农就业的收入与福利水平,动态地对农业劳动力非农就业转移及户籍迁移和城市人口吸纳及排斥起着内生性的调控作用。

#### 参考文献:

- 安虎森,颜银根,朴银哲.2011.城市高房价和户籍制度:促进或抑制城乡收入差距扩大?——中国劳动力流动和收入差距扩大悖论的一个解释[J].世界经济文汇(4):41-54.
- 蔡昉.2009.为什么劳动力流动没有缩小城乡收入差距[J].经济学动态(8):4-10.
- 蔡昉,都阳,王美艳.2001.户籍制度与劳动力市场保护[J].经济研究(12):41-49.
- 陈钊,陆铭,佐藤宏.2009.谁进了高收入行业?——关系、户籍与生产率的作用[J].经济研究(10):121-132.
- 丁菊红,邓可斌.2011.财政分权、软公共品供给与户籍管制[J].中国人口科学(4):45-52.
- 樊纲.2011.中国户籍与土地制度阻碍城市化进程[J].IT时代周刊(11):17.
- 金成武.2009.城镇劳动力市场上不同户籍就业人口的收入差异[J].中国人口科学(4):32-41.
- 李长安.2010.农民工职业流动歧视及对收入影响的实证分析[J].人口与经济(6):27-32,46.
- 李健英.2005.户籍制度在转轨时期的特点及其路径依赖[J].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6):21-27.
- 李实.2003.中国个人收入分配研究回顾与展望[J].经济学(季刊)(1):380.
- 李涛,任远.2011.城市户籍制度改革与流动人口社会融合[J].南方人口(3):17-23.
- 林毅夫,蔡昉,李周.1999.中国的奇迹:发展战略与经济改革[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三联书店.
- 陆益龙.2003.户籍制度——控制与社会差别[M].北京:商务印书馆:177-178.
- 彭小辉,史清华,朱喜.2013.城乡二元户籍制度的认知、现实影响与改革取向——基于上海的实证调查[J].中国软科学(5):27-44.
- 乔明睿,钱雪亚,姚先国.2009.劳动力市场分割、户口与城乡就业差异[J].中国人口科学(1):32-41.
- 任文.1999.市场经济下的户籍制度改革[J].中国人口科学(1):38-41,47.
- 孙宁华,堵溢,洪永森.2009.劳动力市场扭曲、效率差异与城乡收入差距[J].管理世界(9):44-52.
- 田丰.2010.城市工人与农民工的收入差距研究[J].社会学研究(2):87-105.
- 王美艳,蔡昉.2008.户籍制度改革的历程与展望[J].广东社会科学(6):19-26.
- 夏纪军.2004.人口流动性、公共收入与支出——户籍制度变迁动因分析[J].经济研究(10):56-65.
- 邹一南.2014.城镇化的双重失衡与户籍制度改革[J].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2):29-49.

- CHAN K W. 1999. One Country, Two Systems: Rural-Urban Dualism in the PRC[M]// WU H. PRC Political Economy: Prospects under Jiang Zemin. Tainan: Graduate Institute of Political Economy, National Cheng Kung University.
- CHAN K W. 2009. The Chinese Hukou System at 50. Eurasian Geography and Economics, 50(2):197-221.
- CHAN K W, BUCKINGHAM W. 2008. Is China Abolishing the Hukou System? [J]. The China Quarterly. (doi: 10.1017/S0305741008000787.)
- DOROTHY J. 1999. Citizenship Issues in China's Internal Migration: Comparisons with Germany and Japan[J]. 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 114(3):455-478.
- LIPTON M. 1977. Why Poor People Stay Poor: Urban Bias in World Development[M].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OLSEN M. 1985. The Exploitation and Subsidization of Agriculture in Developing and Developed Countries [C]. Paper presented to the 19th conference of the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Agricultural Economists, Malaga, Spain.
- SHI X. 2002. Empirical Research on Urban-Rural Income Differentials: The Case of China [R]. Unpublished manuscript, CCER, Beijing University.
- WANG F, ZUO X. 1999. History's Largest Labor Flow: Understanding China's Rural Migration Inside China's Cities: Institutional Barriers and Opportunities for Urban Migrants[J]. AEA Papers and Proceedings, 89(2): 276-280.

## Research on Household Register Control Mechanism of Urban and Rural Labor and Population Deployment

WU Hua-an<sup>1,2</sup>

(1. Rongzhi College, Chongqing Technology and Business University, Chongqing 400333, China; 2. Yangtze Upriver Economic Research Center, Chongqing Technology and Business University, Chongqing 400067, China)

**Abstract:** An important reason for the long-term existence of large-scale informal emigration of Chinese population is household register system which separates the urban and rural area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conomics, the household register system reform difference in the reform degree and progress between the governments of the cities with different grades has endogenous cause, the results derived from quantitative model show that under the condition that other prerequisites do not change, the original motive power of agricultural labor flow comes from the combined decision with urban and rural utility maximization, that the scale of non-agricultural employment transfer from agricultural labor is endogenously regulated by the household register system threshold with urban and rural two dimensions and by the difference in income and welfare based on the difference in the household register status and meanwhile the deployment of the household register between different cities for the non-agricultural employment of the transferred labor and their carried population are directed by this.

**Key words:** household register system reform; labor flow; agricultural labor transfer; informal emigration; non-agricultural employment; household register transfer; income gap; welfare gap; household register threshold; urban and rural dual structure

**CLC number:** F241.22; C922

**Document code:** A

**Article ID:** 1674-8131(2014)05-0013-09

(编辑:夏冬)